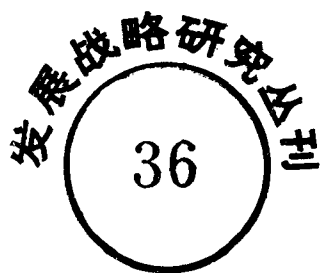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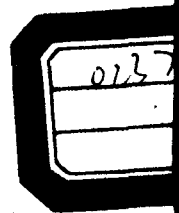
发 展 的 道 路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责任编辑: 李泽清

101



发展的道路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5千字

1985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全年出版40期 总定价: 12元

译 者 的 话

国际发展学会（SID）成立于 1957 年，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级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在世界各地有一百多个分会。它的宗旨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论坛，促进社会各个阶层就发展问题展开相互的、有教育意义的对话，其主要工作包括：南北圆桌会议、变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农业区的创新与战略研究。

该学会第 25 届世界年会论文集收集了一些依据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研究当今世界的各种发展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讨论了“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吗？”、“谁来决定发展策略？”以及“我们要靠谁来贯彻执行这些策略？”等问题。本册所刊登的文章选自这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我们走过的路》，供关心我国发展战略的有志之士参阅。

译者

目 录

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1)
退两步还是进一步?	(6)
过去的教训.....	(20)
发展的人类与文化：成就与失败.....	(27)

发 展 的 道 路

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I. S. 阿布达拉*

如果我们把对发展的认识局限在经济增长上，则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社会始终在发展，因为不争取“发展”的社会是极难生存的；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在殖民者统治下的殖民地也有发展。如果我们只把“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那么印度的铁路网和行政机构，埃及的棉花以及所有类似的东西都可称之为发展。然而，实际的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正式讨论之前，先说一个特殊的例子。

如果某个国家的独裁者决定将占人口一半的国民投入监狱，国民生产总值同样也会增长，因为独裁者不得不修筑监狱，这就需要投资和资本的形成。同时，独裁者还必须雇用监狱看守，为囚犯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和水。所有这些物品和服务的总和通常能够形成国内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某种增长率。当然，这个例子是可笑的，但它说明了传统的指标是多么的不可信，又是多么的不现实，因为在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人民的基本需要或是不能得到满足，或是完全受到压抑。所以，从这种带有限制性的意义上来说，发展未必总是好事情。它可以是坏事情，殖

* 国际发展学会主席，第三世界论坛主席，前埃及计划部部长。

民统治下的发展就是坏情事，不发达与落后是两码事。第三世界的命运没有完全掌握在第三世界人民的手里。殖民统治下的发展是为殖民政权服务的，留给第三世界的只是千疮百孔的经济。

了解到这些问题以及其它受外来控制和干涉的发展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把发展看作是基于维护民族文化统一的头等大事。他们必须抵制那种把现代化或平等与西方化等同的思想，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并不因为其它国家发展了核能或间谍卫星就可以诋毁这种文化遗产，或者把它看成是过时的东西。第三世界有它自己的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念，定能顺利地跨入二十一世纪，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这意味着要抵制西方的一统思想，而接受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交流的思想。

第三世界的某些有影响的人士应当对当前的发展历史负责，因为他们也欣然接受了模仿西方的文明方式以及一切抄袭国外的思想，甚至达到了蔑视自己的文化的程度。他们采纳了声名狼藉的增长阶段的概念。当我们今天读到某些作者建议把每个家庭拥有的小汽车数作为社会进步的指标时，只要注意到环境问题、汽车文化的代价以及由汽车工业给工业化国家带来的各种问题，就会为那些视这种思想为正确的人感到无限地惭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人民是明智的。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为获得政治

上的非殖民化而采取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即有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的长期解放战争。但令人十分惊奇的是，一旦我们获得独立，昨天的敌人却成了今天的善人，使我们又回到殖民统治的权势之下，请求它们帮助我们发展（粗略地说）。某些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和某些知识分子把这看成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失误。事实上，在没有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三十年里的相互关系之前，我们无法讨论发展的成就。

第一个十年主要是亚非国家实现政治独立，拉丁美洲国家基于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把工业化作为一种迅速发展的途径的思想广泛流行的十年。事实上，拉丁美洲成了这种发展战略的实验场地。然而，在六十年代初期，不结盟运动国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政府首脑级会议，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提出了南北关系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召集一次由所有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讨论南北关系的会议，这个会议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开罗召开，发表了《开罗宣言》，实现了走向召开第一次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一步。在第一次国际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南北之间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77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联合发表了一项决议案，决定成立“77国集团”。尽管现在已有120多个成员国，但仍然保留着“77国集团”的名称。六十年代的思想是更多地进行贸易，而不只是援助，这在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概念中是个不小的进步。只要我们有更多的贸易机会，更好的贸易地位，我们就能够发展；我们就能

够生产出发展所必须的资源，不必频繁地依赖国际援助。国际援助，无论是多么真诚，永远不会是中立的。援助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在文化上不是中立的，在经济上也不是中立的。事实上，我们充其量只能把援助当作是充分动员国内资源的一种补充。

然而，由于六十年代工业化国家的高增长率兼顾到了更多的援助和更多的投资，从而使潜在的危机转移了，对抗推迟了。在七十年代，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事情。十三个来自三大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一次作出了在现代史上能影响全球经济的决定。十三个石油生产国的行动开创了在世界体系中权力分享的新纪元，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并且将继承下去，而不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虽然我们可以评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行动，但是它表明了第三世界有能力靠自己作出决定，甚至能够使这一决定影响到整个世界，因此这样一个先例仍然是重要的。

在对这一行动的反应中，曾经有过重新构造国际秩序的企图，比如在巴黎召开的南北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决议案。其后，如果说我们取得了一点进展的话，也只是在以发展一种新的关系体制为目的的南北谈判方面。我们曾召开过各种级别的会议，包括政府首脑级会议，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都令人非常失望。因为他们首先要承受以新的关系形成的国际合作的失败所付出的代价，从而产生挫折感，恐惧感以及表现在

第三世界的杰出人物之间的焦虑。他们将面临着国内的不稳定，暴力行为，恐怖主义行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事实。

此外，在繁荣的六十年代里的高增长率已不复存在，系统的中心正在承受一场不知何时了结的经济衰退。然而，我本人是乐观的，我相信世界上正在出现出全球性村社。我对于克服第三世界的某种“进步”所面临的边缘化、苦难、移民和人口压力是乐观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民是友好亲善的，是信奉和平的。他们认为世界上将不再会有饥饿。他们信奉和平共处、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多元文化的世界以及世界各族人民亲如手足。人们认识到，要使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的摆脱经济衰退和当今世界上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以邻为壑，即使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广大人民群众の深切意愿到处都在表现，南北双方的许多政府经常遭到国内的广泛批评。这使得我相信人类越来越重视相互的协调性和相互的共同利益。尽管不会是明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总有一天会真正地实现全球性村社。当今世界的形成经历了许多世纪，为了建立全球性村社，花费两三个甚至五个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并不算多。

退两步还是进一步？

J. 格 朗 特*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最困难的时期。经济衰退、失业、通货膨胀以及大多数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其它的日益严重和不断扩大的困难，达到了比过去四十年里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紧张的程度，而且还不曾见到有一种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从这种危机里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并且常常是用传统的方法所无法解释的问题。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高瞻远瞩和深思熟虑。但是，在危难之中，人们仍然会有短暂的庆幸之感。因此，我们不仅认识到了当前的艰难困境，同时又体验到了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进步是史无前例的，证实了战后重建家园和国际合作的创造力。

变革远非完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结束殖民主义统治的解放运动之外，大多数变革主要是由工业化国家实现的。尽管人们忽视了许多重要的方面，这些变革仍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四十年的空前飞速发展。为了不致于低估这一发展，我们可以将成就与失败进行对照比较。在本世纪里，世界已经四次面临较大范围的危机，向人民和国家用新的有创造力的方法进行回应的能力发起了挑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前任国际发展学会主席。

战。有两次显然是我们失败了，有两次我们都完全胜利了。进入八十年代后，我们又面临着第五次危机。

四次危机——挑战与回应

第一次挑战我们失败了。当时国际体系的崩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挑战我们又失败了。在二十年代末期，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迫使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狭隘民族主义的和利用短期优势的道路。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不景气最终引起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

然而，世界在经受了幾次教训之后，学会了如何回应第三次挑战，即战争本身。联合国的重要思想是，共同安全总比允许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要好。我们认识到，协调和合作比各国单独行事更能团结一致。随着一些殖民地相继解放，我们还认识到，人民特别情愿为平等、民主和正义的原则作出牺牲，而不赞成蛮横的统治、专政和倒退。的确，许多变革被看作为解放。1945年法国给予妇女选举权就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免于恐惧、免于匮乏*、免于饥饿也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这些教训的真正价值在于世界人民应当尽量避免战

* 这是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中的一部分，即所谓“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

——译者注

争，使世界更加团结，尽管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有所极化，产生了第四次挑战，即重新建立一个被破坏了的欧洲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使之能够容纳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民大众。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其它的新的机构正是这种创造力的产物。

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战争年代里联合起来的国家以及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代表了一种促进人类幸福的倾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外，在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在人民大众普遍承认其原则方面以及在各国政府愿意协同合作，共同实现促进人类幸福方面都是空前的。

那种支持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使得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一百多个新国家。民族自主权经过了四十年后差不多已影响到全世界。甚至还使得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为更多的人所取得的进步比过去的一百年都大。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51岁，婴幼儿死亡数已减少了一半。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家庭和更多的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力参与经济过程，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好处。还有，这种思想，尽管不完全，但仍然在法律允许的平等权利的范围内在更多的国家里团结了更多的民众，不论其性别、人种和信仰。

我现在赞美过去四十年的事情，是因为如果继续保持某些对抗势力，要不了多久，那些值得赞美的事情也许就

不多了。

第五次危机——暗淡的时代

我们现在面临着本世纪的第五次严重危机。在美国、英国、法国、东欧（以波兰为代表）以及与中国、坦桑尼亚和墨西哥完全不同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人民和政府正在分析前辈所制定的许多基本政策并向其发起挑战。

联合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曾断言，“世界正在经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由平稳增长所产生的不稳定和混乱，除非人们采取特殊步骤，否则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的恶果将在八十年代末使绝对贫穷的人数（由八亿）上升到十亿”。工业化国家遭受着劳动大军差不多有百分之十的失业率，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将面临高失业率的景象。在许多国家里，今年的儿童死亡数高于去年，当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使得在八十年代里的儿童死亡数比八十年代初所预计的要多出几百万。比如，在海地的部分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几乎翻了一番，这是现在这一暗淡时代的恶果。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正面临着一场由过去四十年的不断失败而造成的危机。或许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这场危机决不是前辈的成功所造成的。飞速的进步造成了大多数的国家，事实上应当说是整个世界共同体，发展得超越了过去许多成功的制度和政策的作用范围。我们亲眼目

睹了世界的生产能力在三十五年里提高了三倍，更重要的是，人均消费量在短短的时间里翻了一番。尽管这些是令人可喜的，但是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的内部，在商品分配和生活必需品的增长上存在着差异，这就向一九四五年后经济体制的适应性问题发起了挑战。占世界上绝大部分穷苦大众的一百多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创立，使人们可喜地看到它们向过去四十年在空前变化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上的适应性提出了挑战。不充分地注意到人口爆炸、乱采地球资源以及破坏生物圈，我们赖以生存的特殊自然环境将受到威胁。

在这场危机中，三十年代的悲惨岁月向我们揭示了最重要的教训中的三个最本质的东西，失去（或丢失）它们会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威胁。三个最本质的东西是：

第一，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九四五年后不久，降低贸易屏障刺激了历史上最大的贸易扩张，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好处。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合作，仅仅经过了一代人，就使之成为工业化国家最大的并且是获利巨大的市场，同时还是减轻通货膨胀、获取低成本的原材料和加工制造的主要园地。

第二，世界大众已看到，即使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持续世界的发展，则人类进步必须有利于大多数人。这种观点完全还可以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或一个国家的内部。三十年代美国的新政社会条款使得1945年后的美国物质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使美国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都获得了百多倍效益。相反，对于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必然导致像伊朗政府那样的倒台，甚至于在1973年通过提高石油价格而形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没有做到团结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给最贫穷的国家产生了极为沉重的影响。

第三，为了进步事业，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充分利用知识，不仅在自然科学上如此，如绿色革命、电子学和飞行器，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应如此，比如产生新的制度，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布雷顿森林诞生的一些制度以及在中国由赤脚医生形成的三级初等卫生保健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常是形影不离，相互补充的。例如，在1979年人们所取得的经过长达十年之久根除天花的国际合作的伟大胜利，就是由于发明了冻干的牛痘疫苗和创造了高度集中兵力的新的接种方法，这项工作不仅每年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使美国每年在五千万美元的投资上赚取了一亿多美元的收益。

世界系统正在不断地发展，许多问题都是可以预见的。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文明会放弃它对未来的憧憬，撇开它的创造性而屈从于冲突、掠夺和各派力量悬殊的命运吗？有些学者已经声称，上一代人的进步仅仅是一种历史的侥幸。世界发展的前程（以及通过想像和艰苦工作继续取得进步的决心）不致于在一代人的身上被破坏到如此衰败的境地。

因此，我们正处于一场文明危机之中。

那是一场令人敬畏的悲剧。经历了黑暗的时代和战争、

无法形容的暴行和无以计数的残害、大量的掠夺和无情的灾害之后，我们的文明发展了。仅仅在短短的四十年里，通过世界各国政府形成的有组织的文明在认真地谋求建立人类的基本原则，作为广大民众生来就有的权力。还是在这短短的四十年里，点燃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共享平等生活的希望。

拥有资源和知识的世界，第一次坚持保持均衡。如果真能这样选择的话，世界上就会呈现出一种坚决反对民众挨饿、缺医少药和文盲的进取精神。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世界上就能够建立一个有能力维持所有国家和人民经济进步的生产和消费基础。这种有争议的目标，我们是无力实现的。但是，我们有才智去了解我们必须做的工作，我们也乐于去做这些工作。我对于向挑战进行实事求是的回应还是抱乐观态度的。这样的乐观主义是以近代史及其许多事实为基础的。自1945年后的一段较短的时间里，世界上经济贫穷的国家的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婴幼儿的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其平均识字率由百分之三十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强。单单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通过巨大的努力，纵然人口在迅速增长，它们还是使其六岁至十一岁儿童的入学率由百分之四十七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四。此外，还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粮食占有量。

无论根据什么样的历史评判标准，这些事实都是令人激动的。但是，在工业化国家里，人们有时会发现一种倾向，把第三世界看作为需要外部补充的发展的处女地。在

南北对话中处于南方的国家，应当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比如，在1955至1975的二十年间，亚非拉的人民共开垦了22.5亿亩的荒地，比美国、加拿大、日本、西欧现有的全部耕种面积还要大。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十年间，印度谷物产量的增长速率比美国、苏联和中国的都要高。这种努力的结果，加上灌溉面积翻番，使得在占本世纪四分之三时期里死于饥荒的人数是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的十分之一，当时世界人口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中国、南朝鲜、香港、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喀拉拉等国家和地区都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实际的收入水平与美国或英国在1776年美国革命年代的收入水平相当，也仍然有可能克服绝对贫困的恶果，达到工业国家直到本世纪中叶才达到的平均寿命、婴幼儿存活率和基本教育的水平。

近二十年所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不是已经遇到，也不是正在遇到维持人类进步的挑战，而是可能遇到。

就在最近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里，严重的差异却存在于成就所创造的利益之中。综合统计资料掩饰了被饥饿、病魔、文盲所折磨的实际人数，尽管其百分数已经下降，而且我们将着重强调，这些百分数还将继续下降。例如，1970年营养不良的总人数估计约为4亿。可是现在，这一数字大约为4.5亿之多。同样，1960年的实际文盲人数估计约为7亿，1970年却为7.6亿，并且曾经接近过8亿。未来的文盲（即现在6~11岁不在校的儿童）总数是1.28亿，到1985年，这个数字预料将上升到1.37亿。